

## 梅苑蹀躞漫录

○ 王兆乾

（接《黄梅戏艺术》2001年第3期）

过了一座山，前面又是一座更高的山。仿佛进入了山的海洋。越走越荒凉，几十里路都看不见一户人家。队伍里夹杂着几个女同志，可以看出她们是参军不久的，有的还穿着旗袍。

走着走着，只见战士们朝山崖下张望。一匹大洋马不知怎的滚跌了下去，匍匐在那里，兀自挣扎。不知是哪位首长的坐骑。饲养员在旁边，一边拉一边哭。那马腿已摔断，哪里还爬得起来？这是纯种英国马，是从抗日战场缴获日军的。它擅于在平原上驰骋，却对大别山奈何不得。也正如同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对大别山奈何不得一样。曾绍山司令当即下令，不能让这马成为累赘，杀！有的战士叹息着，有的战士悄悄地说：“要改善生活了。”果然，晚上吃饭时，面前有一盆马肉。我吃着清水煮熟的马肉，觉得香气扑鼻，仿佛从来没吃过这样的珍肴美味使我想起孔老夫子闻韶时所说的那句话：“三月不知肉味”。

在反扫荡的路上，遇到方德。他依然抄着手骑在那匹矮小的川马上，旁边是他的通讯员兼饲养员小梅。方德见了我，从马背上跳下来，拉住我的手说：“区党委决定办《皖西日报》，已决定调你过来，你有什么意见？”

## 九、深山的号角

第一次遇到方德时，我就流露出对记者生涯的仰慕。在学生时代，读刘白羽、范长江、邹韬奋、杨刚等人的著作和通讯，那敏锐的洞察力、犀利的文笔、忠实的纪实、辛辣的讽刺，都深深刻在我的心中。在贵阳师院附中高三时，我就和一位姓王的东北籍同学办过一张铅印小报，名叫《学风》。他负责筹划经费和编辑、印刷，我负责撰稿和组稿。

这份小报在那到处贴着“莫谈国事”、人人噤若寒蝉的岁月，只出过两期便夭折了。但却为我留下久远的记忆，也夹杂着一些遗憾。在这两期小报里，我以一个学生的视野，写了些慷慨激昂但却空泛无物的文章，更谈不上深刻的针砭时弊。在第一期上，我有感于浙江大学和贵阳师院教学悬殊，曾写了一篇短文，将学院体育科的一位姓盖的老师奚落了一顿。那老师是上海人，瘦骨嶙峋，上嘴唇总是包不严向外支楞着的大金牙。他每天都穿着运动裤，胸前挂着哨子，但是上课时，他便将手上托着的球向地上一放，说：“你们玩吧。”于是多数同学便作鸟兽散，各奔自己的小天地去了。从来没见过他作过示范，也没听他讲过田径规则 and 要领。而我在浙大附中时，体育课有两位老师，都是国立体专的讲师。一位教田径和游泳，一位教球类。竺可桢校长明确宣布，体育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不及格，不能升级。在湄潭，游泳、单双杠、长跑、排球、足球、垒球我样样都来。可是，现在的学校当局，却被政学系的官僚所把持，根本不把着眼点放在育人上，与科学家兼教育家的竺可桢先生真是天壤之别。所以后来因为院长贪污，引发全校性的学潮，并汇入了全国学生运动的洪流。但是，我把讽刺的对象指向一个穷教师，却没有找对目标。他虽然不学无术，但只不过是混饭碗的小人物。自命不凡的我，又何必来此恶作剧？直到后来这位可怜的老师央人找我父亲向我说情，我才觉得自己有些欠思考了。小报停刊后，我办了份壁报，名为“独角戏”，文章全由自己撰稿，自己排版，倒颇有些辛辣味道，也算在一潭死水中投进了一粒顽石吧。不过，有同学说这是英雄主义。我读过艾思奇的关于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历史造就英雄的文章，听到同学的议论，便注意收





敛些。以后，罗陶他们出了《笔阵》，邀我参加，我便不再唱独角戏了。如今，我真的干起了新闻，觉得前面的路十分光明。但是，对我来说，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学会从纷纭万变的事物中把握本质，不是一日之功啊。

1947年11月底，第一次反扫荡结束，军区进驻汤池畈。汤池畈与岳西县治所在地的衙前街一片大畈相联，相距十五华里，是大别山区最大的粮仓，号称天堂。有“一天堂、二龙山”的美誉。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部形势，部队利用时机休整，继续发动群众。方德立即着手筹办《皖西日报》。这是形势的需要。报社选在腾云庙的一个小山冲里，离军区也有十多里路。这一带群众姓储的多，分散的居民多冠以姓氏，什么储家大屋啦、储家老屋啦、储家花屋啦、储家新屋啦等等。我们选的这一家也姓储，人口不多，却有几间平房，办公和休息勉强能挤下。

报社开始只有六个人。社长方德是新华社野战分社记者，“老新闻”了。1938年到延安，上过抗大。典型的四川小个子。他和藹可亲，容易向他敞开心扉而少有顾虑，但却缺乏领导者的魄力，有时还带几分幽默。一次行军在包家河，那里的老乡因为缺碘，大都患有瘰疬，当地称为“泡颈”。晚上宿营，他忽然顺口吟出一首打油诗：“泡颈实堪夸，敢当大风刮，新婚燕尔夜，试吻瓜对瓜。”引得我哈哈大笑。在昏暗中我却听不见他的笑声，他正经地说：“抗战八年，山里人几乎吃不上盐，如今国民党又对咱封锁，一石米难换一斤盐。老乡不吃盐咋行？就要害泡颈。改变这种局面的责任，历史地落在咱们身上。”是呀，大别山的老百姓长期没有盐吃，菜坛子里的腌豇豆全是臭的。老乡没有盐，就熬硝代盐，使菜里有点咸味。一次行军到包家河，在一所较大的村里，老乡们几乎人人都害瘰疬。在厨房的墙边，离灶台不远，一口直径一米多的大水缸半埋在地里，大约是为了便于挑水人向缸里倾倒。恰好，我身边有个盘尼西林瓶装着碘酒，还是我从白沙中学带来的，防备受伤挂彩，便偷偷向缸里滴了几滴。我不知道碘酒所含的碘份是不是能被人体吸收，但我知道几滴碘酒在大水缸中被稀释，总不会有

多大危害。当我向缸里滴碘酒时，也有些提心吊胆，生怕被什么人看见，以为我是在投毒。我知道人生是复杂的，但更同情那些因缺碘而患病的老乡。

黎蒺担任编辑，他的中文基础好，读的书也多。抗战时，他在桂林就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我们上山不久，在水吼岭，他听人介绍1934年岳西清水寨暴动，以刘正北、王效亭、凌霄、卫赤、王进等为首成立了苏维埃和红34师。但是，一些红军领导人却牺牲在霍山诸佛庵自己同志的枪口下。他感慨地在纸上写了“左倾幼稚病”几个字，这是列宁一本书的标题。我却未曾料到，这种幼稚病在随后的年代里使他和我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对于黎蒺，我挺尊敬，这倒不全因为他是我的好友罗陶的哥哥，他的稳健、持重，有时使我自惭。尽管我的活跃可能是个优点，也许在他眼里是锋芒太露。

还有一位杜恒贤，上士。“上士”这个名词在八路军里很特别，并不是列兵、上士、下士那种军阶，而是管理后勤的下级干部，要比司务长和管理员低一点。大的机关有管理员甚至管理科长，小的单位有名上士管理生活就够了。这位上士，家在太行山的武安一带，听口音像是山西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在太行山东麓，是河北省的武安县。方德说他原是个药材工人。中等偏高的个条，剃着光头，黑脸膛上刻下深深的皱纹，显示着他久经风霜的经历，看上去已有三十五六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忠厚长者。他腰间总系着一个白土布包袱，里面是他的账本和小算盘，还有纸笔、私章什么的，再就是一摞他在南下时没来得及交账的冀南券和北海券。那时，蒋管区的钞票在大别山已被废止，这对天天面临物价飞涨的老百姓来说，无疑是福音。但是流通却是个大问题。随军带来的冀南券和北海券因为没有后援也不能通行。向群众筹粮弄菜只能先打条子，积累到一定程度才用银元结算。为了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军区派出一个团主力打通封锁线掩护和接应从中原送过来的光洋。这些光洋分散给战士干部保管，每个战士身上挂着两条细长的布袋，一条行军米袋，一条光洋袋。将银元一个个平铺在只有它的直径宽的布袋内，再用针线钉牢。那米袋和银元袋交叉斜挂在肩上，





就像挂着两条白色的自行车内胎。这是坚守大别山的战士的特殊装备，也算一种景观吧。有一次夜间，我和老杜走在一个山谷里，突然听见灌木丛中有稀里哗啦的行动声，他立即警觉起来，猛地把我按倒在地，高喊：“口令！”可是没有应声。那声音依旧在附近断断续续响，他又喊道：“一排向左，二排向右，三排跟我上！”刷！一头野猪被惊，穿过山谷，跳进干枯的稻田。兵不厌诈，在那随时都可能遭遇敌人的年代，他的机智、沉着和敌情观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一直关心着我，给了我很多帮助，是我入党的介绍人。每天晚上，他总打开包袱，在桌旁盘账，我喜欢坐在一旁，听他说战斗故事，什么上党战役呀、孟良崮战役呀、张家店消灭八十八师呀等等。第四个人名方雨亭，参军不久。年约二十岁，白皙的面孔近乎失血，短个条，说一口桐城方言。听说他是桐城的，又姓方，就联想起桐城派的方苞。高中时，有一位流浪到贵阳的中文老师叫张叶芦，讲的话和方雨亭一个腔调，而他的小弟弟张叶苇，又和我同班同学。弟弟说，他们是清朝宰相张英的嫡系。哥哥上课时喜欢离开课文介绍桐城派文人方苞和姚鼐。方雨亭既是桐城方家的，我想他一定有学问修养吧。虽然我觉得他缺乏男子气，但还是向他投以友好的目光。不久我就发现，他不论在什么场合跟什么人都爱搭讪，有点顺着竿子爬的味道，并没有什么理想，也没读过多少书，不时流露出市侩习气。一次反扫荡急行军，大队队伍行进在包家河的路上，这是大别山的深处，山高林密，队伍只能鱼贯而行。他突然说没烟抽了，要我陪他找老乡买黄烟。山势很高，路是盘山道，在一条岔路口，他要我一同沿岔路去寻找人家。我怕掉队，本不愿去，但却碍于面子，只好随他。走了半里之遥，并不见人家，左边头顶是一片松林，右边脚下是陡峭的山坡，万籁俱静，只有松林间沙沙的风声和脚下的嘎吱云雾。我警觉起来，这是战争环境啊，敌人就在后面尾随，万一掉队，后果将不堪设想。我立刻喊他停住，回身跑步返回原路，追赶队伍了。我调头看，他也尾随着，一脸沮丧。

还有一位名叫王辉，辽宁人。钢版字写得很出色，刻写任务就由他负责。他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不苟于言谈，大概他在连队生活的时间长，还带着浓厚的部队作风。大军渡江以后，他又随军南下，在雾都重庆担任了个部门的领导。

第七位名叫马夜聆，后来改名马野林，女，潜山水吼人，一米六五的个条，浓眉大眼，微黑的皮肤，连嘴唇也乌紫乌紫的，却有一嘴齐整的牙齿。谈吐间并不忸怩作态，有几分男子气。不知谁给她取了个绰号——黑牡丹。她高中毕业后曾在县城的国民党部找了份抄抄写写的工作。没干多久，在老家遇到了游击队，便背上背包上山了。我和她早在上五河便见过面，那时她也在女作家曾克的工作组，被分在柳上小组。只不过很少交谈罢了。她的任务是发行。那时的发行，和边区送鸡毛信差不多，完全依靠区乡的交通员网络。看来，方德对各个部门都有了安排。我的工作搞外勤——通联，按方德的想法，在各团队建立通讯员网络，自己也采访些专稿，好的文章则向新华社发稿。

区党委对办报很重视。不几天，从司令部通讯科调来一台美国军用收发报机。竖形的机身，喷着军用的草绿色，上面还有一排排的英文，标示着制造厂家。随机还从情报科调来报务员和译电员。译电员在部队是个非常机密的工作。为了防止泄密，所用的不是明码电报，而是随时变换的密码，这密码都是按绝密的方法定时更换。所以译电员平时很少与人接触。而报务员则不然，他不论抄报还是发报，都不知道内容，收发完毕，往译电员手上一递，就找人唠嗑去了。新华电台有定时的记录新闻，也可以从收音机收听。但是延安的电台和邯郸电台，功率都不强，国民党发出强大的干扰信号，有时几乎无法收听。这也有办法，部队每半个月，就通过密码接到通知，某天至某天，短波波段多少、波长多少兆赫，是新华电台的秘密波段。有了这个随时更换的波段，很多新闻和社论都能够抄录下来。山里没有电，收发报要用与收报机配套的手摇发电机。这可是个不轻松的活儿，司令部特地给报社配备了一个马达班，行军时扛机器，平时轮流摇马达向报话机供电。人





数猛地增多，司令部便给报社一个代号：九小队。

方德一心想有台铅印机，但是，在荒芜的大山里，想得到它真比登天还难。衙前街有一片小石印作坊，平日印印布告、家谱、广告之类。石印，是一种很特殊的印刷业，没有活字，不用排版，一切编排都在誊清稿上进行。只要用毛笔蘸一种特制墨汁，将文章和版面写在特制的纸上，然后反拓到四开大的石版，便可在石板上涂墨印刷了。那石板质地非常细腻，据说也是进口的。说也奇怪，没拓上字的地方油墨丝毫不沾。本来，印刷机的石版用铸铁架撑着，摇动齿轮手柄，带动橡胶辊筒和加压轴，就完成一张黑白印制品。为了应付反扫荡的环境，索性将铸铁机身舍弃，改用油印机胶辊和棕毛刷纯手工印刷了。

为了抬这块石板，司令部又派了四名战士，行军到哪里，就在哪里出版。大别山出产一种楮皮纸，韧性极强，单面印刷，尚可对付，只是短缺那种特制的墨锭和誊写纸。据说都是从欧洲一个小国进口的。如今国民党军队将大别山围得水泄不通，材料就更金贵了。就这样，方德还得陇望蜀，想出铅印报。他凭着野战分社记者的身份，求各分区部队、首长作战时注意物色铅字和印刷机。不由人不佩服他那股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

十二月初，中原正酝酿着新的大战役。而我们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敌人扫荡的频率越来越密，而且开来了四十八军。这支广西部队八年抗战就驻扎在大别山的水吼岭，轻车熟路，再加上他们的基层长官多半在大别山找了老婆或姨太太，社会关系复杂。无疑，对我们是极大威胁。方德决定先出油印报，大家都忙碌起来。方德本人是随军记者，所以他对在大别山采编的文章很看重，便要我去采访。我知道这是给我机会锻炼。在他的提示下，我到了相山一个休养所，这个休养所一批手无寸铁的伤员在敌人已经形成包围时，使用疑兵之计，拖动扫帚，扬起灰尘，并在山林中扛着用扫帚伪装的机枪，时隐时现，敌人以为是作战部队，望而却步，从而保全了自己。通讯题目是《相山上的斗争》，在创刊号和第二期上连载。这是我第一次用“本报记者”名义发表的通

讯，手捧楮纸印刷的报纸，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我终于在事业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一天，来了个新华社野战分社随军记者。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深灰的土布军服，还是太行山的产品。绑腿扎得齐齐整整，斜背个日本造皮挎包。这种挎包是日本人专用来装军用地图的。我见过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折叠得和挎包一样大小。那地图非常精密，一棵独立树也不遗漏，大别山拐拐落落的小地方，等高线都标得清清楚楚。一位参谋说：“小日本侵略中国是早有准备的，你看，他是咋弄的，测绘得这么详细！”不过在战场上，我们的指挥员也物尽其用。一次，在霍山诸佛庵遭到敌人46师一个营的伏击，只听曾绍山司令喊：“警卫员，拿地图来！”警卫员立即从挎包里找出地图，平摊在地。曾司令用手一指，命令说：“警卫排占领制高点！”

杜宏一来就对方德发出感叹，四十八天大行军，几乎什么消息也不知道。他戴上耳机，转动着报话机的收音旋钮，搜寻着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过了一会儿，我隐隐听到陈波儿演唱的《兄妹开荒》开始曲。多么熟悉、多么亲切的歌声！这是1947年地下党在上海制作的唱片，兴许是解放区的第一张唱片吧。开始曲后就是口语新闻。杜宏从胸袋掏出一枝大号派克笔，急速地写画。我一声不响地注视着这个老记者的一举一动，可是除了拉丁字母外，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写画什么。他兴奋地对方德喊道：“社论，毛主席写的！”方德要他全文记录，好在报纸上发表。等他忙活以后，把收听来的文章翻成方块字后，我才瞄准机会好奇地问他，是用的什么速记法？他操着山东青岛口音说：“瞎捣鼓，自己搞了个速记法。”想请他教我的一句话已到了嘴边，我又收回去了。我知道，他在这里时间不会长，要他教我是不太可能的。（待续）

责任编辑：潘英